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标志着人类认识和揭示自然奥秘的飞跃和深化。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冲击下，在当代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一批崭新的学科、思潮和观点，以期解决世界向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

会主义，就必然要放眼世界，引进和借鉴当代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就是立足中国，立足当代，精选当今世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出现的新思想、新的有重大影响

思潮、新观点

当代史学 主要趋势

著 者 /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译 者 / 杨 豫

● 上海译文出版社

Geoffrey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HISTORY**

Mouton Publishers, 1978

根据莫顿出版社 1978 年版译出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著
杨豫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34,000
1987 年 2 月第 1 版 198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0 册

书号：11188·54 定价：2.65 元

译者的话

本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0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系列丛书的历史学卷。作者系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巴勒克拉夫学贯古今，除了史学史，对西方上古史、中古史、近现代史、当代史和国际关系史也有极深的造诣，先后执教于英国圣约翰学院、剑桥大学、利物浦大学、伦敦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布琅德斯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曾任英国历史学会主席，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历史学家之一。他一生多著述，主要著作有《公证员与罗马天主教廷》(1934年)、《罗马天主教廷圣职委任制》(1935年)、《中世纪的德意志》(1938年)、《近代德国探源》(1946年)、《中世纪的欧洲》(1950年)、《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5年)、《英国早期社会生活》(1960年)、《欧洲思想和行动的统一》(1963年)、《当代史导论》(1964年)、《历史与百姓》(1967年)、《中世纪的东欧和西欧》(1970年)，他还是《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1956—1958年和1958—1960年各卷的作者和《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册》(1978年)的主编。

1976年，他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负

责本书的起草，在列宁格勒大学教授 I·S·科恩和哈佛大学教授 K·O·戴克的协助下，历时两年，完成本书，经过集体讨论后定稿，用英文和法文同时出版。本中译本按英文版译出，同时参照了法文版。

全书共分七章，对战后、尤其是五十年代中叶以来世界各国历史研究的主流和新趋势作了系统、全面、详细的阐述和分析。前三章概括了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传统历史学面临的挑战、历史主义的兴衰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对西方、苏联和第三世界各国历史研究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起点、途径和主要特征以及当代主要新史学流派的兴起作了精辟的分析；介绍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互结合、渗透和交叉的必然性和产生的成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学新分支和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并对新方法和新技术的优缺点，特别是对计量史学的功用和局限性进行了评价。在后四章中，作者着重阐述史前史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历史学的重大发展以及“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消亡。巴勒克拉夫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对国别史、地区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从中得出结论说，目前“真正

的世界史”尚未诞生，开展历史的比较研究，尤为必要。对于各国档案馆、文史馆、博物馆、大学、研究所和科学院在历史学研究新方向和新趋势的冲击下，在社会科学方法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引进后发生的组织变化及其积极作用，作者在充分予以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弊端，并呼吁要高度重视作为个人的历史学家的重要作用。总之，当前历史学发展趋势中虽存在有待克服的问题，但前途是乐观的。

本书不是按时间先后和国别逐个地罗列各个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著作并加以评价，而是以当代历史学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贯穿全书。在作者撰写过程中，一些国际学术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的国家委员会提供了各国历史研究发展和现状的专门报告。作者还参考了近二十年出版的史学著作数百种，读者从中足以窥见当代历史学研究的全貌。

由于内容丰富，观点鲜明，资料详实，取材广博，评价公允客观，本书被欧美各大学列为史学史的必读参考书，对于我国史学工作者肯定也会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译者在翻译时得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系主

任 H.T. 狄金森教授的支持和帮助。狄金森教授还特为中译本写了序言。译者借此机会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中译本在译校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教授王觉非先生和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先生的具体关心和帮助,特此鸣谢。当然,译文中出现的错误和不足应由译者本人负责。

杨 豫

1986 年 9 月

于南京大学

序言

三十年来，世界各国的历史研究都有巨大的进展。这意味着当代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了解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代历史学家。但是，比历史知识的巨大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在如何对过去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上发生了重大的革命。近年来，历史学应当研究哪些方面，采用哪些方法，如何对过去作出解释，以及历史研究工作如何组织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教授对当前历史研究的主要趋势所作的阐述，全面介绍了这些深刻的变化，他的这部著作应当作为每个严肃认真的历史工作者的必读书。

巴勒克拉夫教授的这部重要著作共分七章。在第一章，他探讨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研究的主要变化。他说明了历史学在这个时期是如何发展成为一门专业性更强的学科，并且论述了历史学家如何扩大了历史学的范围以及如何把历史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历史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这一章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追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世界各国历史学家的影响，特别是对美国历史学家的影响。巴勒克拉夫教授指出，到五十年代，任何历史学家（甚至包括那些反马克思主

义者）都不可否认睿智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态度对历史学产生的积极影响，并且必须正视这场挑战。

巴勒克拉夫教授在第二章解释了五十年代以来历史学家们对新的历史理论和新方法论的探索。他阐明了几乎所有国家的历史研究如何受到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越来越大的影响。他高度评价了法国年鉴学派等学者，是他们扩大了历史学的领域，扩大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使历史研究更为科学化。这一系列的发展要求历史学家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其中主要是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结果，加强了特别是对社会结构的研究。

巴勒克拉夫教授在第三章充分而详细地研讨了这些新方法，特别是更为详细地追溯了社会科学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他阐述了历史学家如何越来越注重于对追求科学严谨性这一理想的需要。这导致历史学家的研究重点从特殊转向一般，从表面事件转向内在环境，从叙事式转向分析式。为了研究事件在其中出现和历史人物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典型的、基本的结构框架，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家借用了“模式”。在历史学家所采用的新技术中，最重要的往往是以数量巨大、只可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的统计资料为基础的量化分析。五十年代以来，量度和量化技术实际上涉及到了历史探索的每个部门。

在第四章，巴勒克拉夫教授阐述了五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学家不仅采用了新的方法去研究过去，而且对以往被许多历史学家所忽视的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表示关注。他论述了亚非历史学家以及欧美历史学家对非欧洲世界研究的兴趣的急剧增长。五十年代以来，日本、中国

和印度等国的历史研究取得了特别迅速的进展。这些国家新史学的基本特征同西方史学一样，都是优先研究社会和经济问题。

巴勒克拉夫教授在第五章着重阐述了现代历史学家近来获得的日益增长的知识如何置于一种体系中才可能使这些知识变得有意义，从而使历史研究得以进行。这引导着历史学家从优先考虑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向对区域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和比较史学抱有更大的兴趣。这还鼓励历史学家去探索人类在社会中进化的完整理论。巴勒克拉夫教授相信，马克思主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学家当中是产生了最大影响的解释历史的理论。

巴勒克拉夫教授在第六章扼要地叙述了当今世界上历史研究工作是如何进行组织的。他证明了，近几十年来训练有素的、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家在数量上不断增长；他们从事的那一类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倾向也在不断地加强。他说明了历史学家所掌握的越来越多的知识如何使他们比过去更加依赖有成效地组织起来的档案馆；还说明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现在如何由大量的历史学刊物给予发表；他们的研究活动如何在数量越来越多的历史系、科学院和研究所里组织起来。

巴勒克拉夫教授在第七章，也就是结论中考察了七十年代末历史研究的状况。虽然他看到了一些有待克服的问题，并且认为科学的历史学尚未取得完全的胜利，但是，他坚信科学的历史学正在一往无前地迈进，陈旧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态度正在退却。巴勒克拉夫教授对于科学的历史学的胜利也许过于乐观了（同时，由于他过多地强调了计量史学，从而忽视了文化史和思想史，尤其是忽视了民众精神的历史），但是毫

毫无疑问，这部著作仍然是介绍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新型历史学研究发展的一部最优秀的著作，也是一部最基本的著作。对于希望了解历史学这门学科近几十年来的变化的每个严肃认真历史工作者来说，巴勒克拉夫证明自己是一位胜任的专家和导师。他极为公允地评价了这些变化：他赞扬了这些重大的变化，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有必要对有些历史学家为什么会抵制这些变化的原因作出解释。

哈里·狄金森
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

前言

为了不致引起误解，有必要着重指出本书的目的不是全面叙述当前所有国家和所有地区的历史学著作，而是讨论当代历史学研究中显然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趋势。大量的历史著作——也许占全部成果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完全是因袭常规的，虽然增加了大量知识，却没有（也无意图）指出新的方向，提出新的方法。正因为这个理由，有些著作尽管非常出色，这里也不作专门论述。其次，我关心的重点不是专门史领域（例如科学史、法制史等），尽管其中的某些方面近年来进展卓著，而是对一切地区和国家的所有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影响的总趋势。当然，本书写作的总设计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学家，抱那样的期望显然是愚不可及的，更不用说在本书写作中对有关主题的组织结构和选择了。我对自己知识方面的严重不足无论如何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尽管这样，我仍然准备就全球范围的历史学研究状况作一番讨论，因为我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全球性。如果说我在本书的写作中避免了错误的话，那是因为许多个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

委员会为本书提供了各种报告和意见。这里特别要提到澳大利亚、比利时、智利、芬兰、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等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提供和提交的报告和资料以及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和国际历史学委员会协同汇编的许多个人的论著和评论，这些材料都使本书得益匪浅。我想在这个适当的场合特意向为我提供报告和文件的各国鸣谢。然而，由于我受惠之多，我无法在这里向所有的人逐一表达我的谢意。不过，其中许多个人和团体是我必须特别致谢的。首先，我应当向《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的总编辑雅克·哈维先生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如果不是他给予有时陷于困境中的我以不倦的帮助和鼓励，几乎可以肯定，本书是难以完成的。其次，我要感谢两位起草人：I·S·科恩（列宁格勒大学）和K·O·戴克（哈佛大学）。我对他们三人的感激之情，远不是寥寥数语足以表达的。此外，我应当向苏联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和基础科学图书馆的F·A·费多罗娃博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她给予的帮助超过了我有权期望的程度。我还应当感谢彼得·哈纳克博士（布达佩斯大学）、萨蒂什·昌德拉教授（新德里大学）和萨多诺·卡托迪尔德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印度尼西亚国家委员会协调人），他们起草的报告和分析，在我看来，起了非同一般的启发作用。最后，我应当向J·德昂特教授（根特大学）、N·A·埃罗费也夫教授（莫斯科大学）、J·R·T·休斯教授（美国西北大学）、亨利-伊雷内·马鲁教授（巴黎大学）、查尔斯·莫拉泽教授（巴黎大学）、让·多梅松先生（巴黎大学）、博伊德·C·谢弗教授（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大学）致以热忱的谢意。同时，我还要衷心感谢墨西哥驻

巴黎大使西尔维奥·萨瓦拉先生，承蒙他读过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坦率和中肯的意见。我还应当向我过去的学生马克·奥洛夫斯基(布琅德斯大学)表示我个人的谢意。他同我进行过多次生动的讨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然，本书的写作以及其中的错误和疏漏之处完全由我本人负责。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但是，还不止于此，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合格的历史学只可能是科学的历史学。……我们若牺牲对科学确定性的要求就不能不损伤我们对文明的良知。神话般地或虚构地描述过去或许具有文学价值……但是，……那决不是历史。

——扬·赫伊津加：“历史概念的定义”

目 次

序 言

前 言

1

1 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从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

1.1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 6

1.2 历史主义的危机 15

1.3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史学 26

2 探索新概念和新方法

3 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

70

3.1 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的贡献 76

3.2 心理学和历史学 101

3.3 经济学和人口学的地位 113

3.4 历史学的计量化 131

3.5 现状 139

4 历史学的新领域

148

4.1 史前史 166

4.2 非洲史	172
4.3 拉丁美洲历史学的新格局	181
4.4 亚洲历史学的当代趋势	192
4.5 第三世界历史研究现状	222
<hr/>	
5 探索历史学的意义：国别史、比较史 学和“元历史学”	233
<hr/>	
5.1 国别史和地区史	236
5.2 世界史的前景	242
5.3 历史哲学和“元历史学”	259
5.4 比较史学	268
<hr/>	
6 历史研究工作的组织	282
<hr/>	
6.1 史料的获得和档案机构	292
6.2 新研究技术的影响	305
6.3 大学、科学院和研究所	314
6.4 历史学家个人的地位	322
<hr/>	
7 结语：当前趋势和问题	327
<hr/>	